

瓦窑堡的炭

郝随穗

“天下堡，瓦窑堡”，是对陕北瓦窑堡的一个美誉，这个美誉包含的主要内容是，瓦窑堡最先开了用当地盛产的煤炭烧制陶瓷和烧制青砖修建窑洞的先河。瓦窑堡人早在史前就开始用瓦窑堡的炭烧制的青砖修建窑洞，改写了陕北窑洞的建造史；瓦窑堡的炭烧制的陶瓷，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于是不知从哪一辈人开始，在陕北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直到现在，都具有标志性的地域指向意义。米脂的婆姨指的是当地出了个貂蝉，绥德的汉子说的是英俊威武的韩世忠是绥德人，而清涧的石板讲的是当地出产的青石板是陕北最好的石材，那么瓦窑堡的炭不仅是整个陕北最好的燃料，更是陕北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团火，这团火从古至今烧暖了陕北的窑洞，延续了陕北乃至西北的烟火气。

瓦窑堡所处的位置在陕北的中心地带，煤藏十分丰富，山体可见裸露煤层，民众开采始于史前，兴于宋代，延续至今。《地质辞典》中称瓦窑堡的炭为“瓦窑堡煤系”，属于地质年代中生界晚三叠世，以其特低灰、特低硫、低磷，高发热量、高粘结指数、高焦油产率等特点，被称为天然化工精煤最佳配焦煤，有关专家称之为“天然化工精煤”。瓦窑堡的炭油脂大，容易着火，当地人说，这炭灵验好烧，急用时用一张纸就可以点燃。被点燃的炭很快就会冒出黑色黏稠的油脂，燃烧的油脂发出滋滋的声音并扑闪着蓝色的火苗，散发出一缕缕浓浓的烟来。

这念头，怕是在心里盘桓了许久，许久了。中国的文人，似乎骨子里都有这么一种“朝圣”的情结。司马迁的老家在韩城的龙门，我未曾去过，只在《太史公自序》里读过那“耕牧河山之阳”的少年气象，那该是怎样一片雄浑的水土，才能养出那般囊括天地的史笔？蒲松龄的“聊斋”，在淄河的淄川，我也只是神往，想象着那几间老屋下，夜雨秋灯时，狐鬼是如何带着人间的温情，从纸墨间袅袅走出。曹雪芹北京西山的旧居，我倒真去过一趟，可惜那时节，正为着一纸毕业论文焦头烂额，满心是世俗的功名与尘虑，在那荒疏的院落前，竟未能静心体味一番“满纸荒唐言”背后的辛酸。如今想来，仍是憾事。至于绍兴的鲁迅故里，北京东城区老舍先生的丹柿小院，这些地方，都像一枚枚文化的印章，深深地钤在我精神的版图上。

然而，最令我魂牵梦绕的，却是这白鹿原下的西蒋村，是陈忠实先生的故居。这向往，不同于对古圣先贤的遥敬，倒更像是对一位刚刚别离的、可敬可亲的师长的探访，带着体温，带着余响。这一天，终于在2023年的7月14日，这个最平常的日子，到来了。

村子是静的。作为灞桥黄土高原延展而去的白鹿原，坦荡荡地铺展开来，像一头巨兽沉睡的脊梁，而这西蒋村，就偎在它的西北角上，安详得像一个摇篮。几条泥土石子铺就的小路，清瘦地，纵横着在村中蜿蜒，路两旁竟有些绿竹，不是北方常见的杨、柳、榆、槐那般粗豪，而是南国女儿似的，纤细而茂密地从生着。风过来，也只听得见一阵簌簌的、私语般的声响，将暑气与喧嚣都滤得远远的，剩下是满眼的幽静。我的心，也跟着这幽静，一点点沉了下来。

故居的门，是紧闭着的。两扇被油漆成朱红色的黢旧的铁门，将我热切的视线生生截断。我只能仰起头，透过那高高的、用本地常见的青石与红砖垒起的围墙，向里张望。院子里，也是密密的竹子的梢头，在夏日的微风里，轻轻地摇曳着，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我便想，先生在世时，该是怎样在这竹影婆娑的小院里踱步？是在构思《白鹿原》里白嘉轩那挺得直直的腰杆，还是在琢磨田小娥那一声幽怨的叹息？那沙沙的竹叶声，是否曾陪伴过他无数个为一句话、一个细节而绞尽脑汁的夜晚？这紧闭的门扉之后，封存着的，不只是一个物理的空间，更是一段当代中国文学的传奇，一个“民族秘史”的诞生地。我仿佛能看见，一个敦厚而结实的身影，就坐在那窗下，指间夹着雪茄，眉头紧锁，或豁然开朗，将半生的心血与思索，都灌注到那一页页稿纸之上。

小院的外墙边，立着一块指示牌，橘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陈忠实故居”五个字。隔壁，又是一块牌子，是“西蒋村简介”。而最让我心头一热的，是村口处的那一块：横着写的是村名“西蒋村”，下面却竖写着一行字——“忠实路”。

我的脚步，不由得在这“忠实路”的牌子下停住了。这真是一条极寻常的乡间小路，坚实、质朴，甚至有些粗粝，与关中平原上成百上千个村庄里的道路并无二致。然而，这名字，却是村民们最朴素、也最隆重的加冕了。他们没有用那些华美的辞藻，只用了先生的名字，用了那最能代表他品格的两个字——“忠实”。这路，因他而有了名字，这名字，也因他而有了沉甸甸的重量。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认可，是一种比任何官方褒奖都更贴近人心的怀念。路是沉默的，

的炭，剥下那层蜡捣碎给他用水冲服，这才止住了。那名外地司机不可思议地说，你们瓦窑堡的炭简直是神了！煤矿上一名工人给一名外地人介绍瓦窑堡的炭能擦着火柴，那人不信，工人掏出一根火柴，在炭的一个平面上划，火柴头着了。那人兴奋地拿起这块炭惊讶地说，瓦窑堡的炭牛！

煤矿周围有很多废弃的井窑，都是先前的人挖炭留下的。门前河滩的山崖上可见的几层煤层夹在山崖中，庄里人烧的炭，大多是从这里挖的，或者在路边捡拉煤车上掉下来的小煤块。前庄里一个人天天去河滩里挖煤，然后换米换油，卖点小钱，竟然养活了一家五六口人。

陕北的冬季会在第一场大雪中迎来寒冷的天气，被皑皑白雪覆盖着的千山万壑中的每个村庄的烟囱里，袅袅升起的烟就是瓦窑堡的炭燃烧后的那缕烟火气。冰天雪地的日子里，瓦窑堡的炭作为最重要的燃料，在陕北各地的窑洞里的灶膛里，烧得红彤彤的像一缸米酒，让寒冷的日子多了一份微醺的抒情。

陕北不仅有信天游，更有暖到心窝子的瓦窑堡的炭。无论是在陕北人的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中，还是在当下的幸福生活中，瓦窑堡的炭作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燃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天生就懂得精神浪漫，并通过民歌表达的陕北人，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一次次打起腰鼓、扭起秧歌、唱着信天游时，瓦窑堡的炭给了他们敲鼓点的劲儿、扭秧歌的魂儿、唱民歌的好嗓子，给了这片土地雄浑而辽阔的艺术气质。

但它通向四面八方，就像先生的作品，从这小小的村落出发，最终走进了无数人的心里。

站在这条“忠实路”上，我与先生有限的几次交往，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便是2005年夏，我的三卷本选集即将出版之前。那时节，我心里是惶恐的，也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鼓起勇气，给陈忠实先生写了一封信，恳请他能为我即将正式出版的书写一篇序言。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何等的糊涂，又是何等的天真啊！先生其时已是名满天下，一部《白鹿原》如泰山北斗，每日里有多少事务需要处理，有多少文稿需要披阅？我这样一个没多少名气的后生，竟给先生提出这般“过分”的要求。

不久，先生的回信竟真的来了。信上的字迹，是那种我所熟悉的、带着关中人的朴拙与力量的字。他没有应允写序，只是温和而坦诚地说：“写序可能时间不够用，是不是给你题个字？”我捧着那封信，心里是说不清的滋味，有被婉拒的些微失落，但更多的是被先生这份真诚与宽厚所打动的温暖。他没有用任何虚与委蛇的客套来敷衍我，而是给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饱含善意的方案，这，便是陈忠实了。

后来，我的三卷本选集终于出版了。我带着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兴冲冲地跑到省作协，想当面送给先生，再说一声感谢。不巧，先生不在。我拨通电话，那头传来先生那浑厚而略带沙哑的、极富特点的关中口音。我自报家门，说明了来意，又特意补充道，在我的散文卷里，收录了一篇评论他《白鹿原》的文章，大约有一万字，希望先生有空时能翻一翻，批评指正。

先生静静地听着，然后，在电话那头轻轻地说了一句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可惜那本书已经出了，要不然可以收进去的。”

先生所说的“那本书”，我后来才辗转得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永远的〈白鹿原〉》。那一刻，我握着电话，竟一时语塞。心中涌起的，不是遗憾，而是一种被认可的、巨大的激动。我那篇浅陋的文字，竟能得到先生如此认真的对待，他甚至觉得有收入专集资格。这份对一个普通写作者的尊重与提携，比任何奖赏都更令我动容。

说起那篇评论，便不能不提我阅读《白鹿原》的经历了。那真是一段酣畅淋漓、终生难忘的精神盛宴。起初，是李野默先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讲。那时，我几乎是掐着指头算日子，一到播出的时间，便守在那个小小的收音机旁，屏息凝神。李野默先生那深沉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将白鹿原上的风雷雨雪、爱恨情仇，一字一句地送到我的耳边，送到我的心里。那是一种声音的“铸造”，将文字化为了有生命的实体。

这还不够。当《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全文刊载《白鹿原》后，我更是第一时间找来，如饥似渴地通读了一遍。那密密麻麻的铅字，仿佛有着滚烫的温度，烫着我的手，烫着我的心。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黑娃、田小娥……这些名字，不再是小说里虚构的人物，他们成了我精神世界里活生生的邻居，他们的命运，紧紧地牵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

到了1993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本问世。那年8月底，我正好要去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路过西安时，便迫不及待地买了一本。到了北京，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件事，竟不是去领略彼时的京华烟云，而是不顾旅途的劳顿，在鲁院那简朴的宿舍里，就

陕北乡俗中的除夕夜，家家户户垒火塔，要燃烧到第二天天亮。瓦窑堡的炭易燃耐烧，烧下的残骸叫兰炭，是当地人第二次利用的燃料。兰炭放入炉膛或灶膛，扑上来的蓝色火焰三天都不会熄灭。

去年回老家过年，午饭后带着孩子去河滩里挖炭，河滩里的山崖上夹杂着几层炭，用铁锹挖几下，就能装一筐子炭。用挖回来的炭在院子中央垒火塔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用一层一层瓦窑堡的炭垒砌的火塔像个小宝塔，塔尖上用一小块黑得发亮的炭压一张巴掌大小的黄纸，黄纸十分抢眼地在腊月的寒风中抖动着。陕北人在除夕夜的火塔尖压黄纸是一种祭祀方式，一是缅怀祖先，二是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等到年夜饭端上桌，院子里的火塔也要点着了。除夕，瓦窑堡的炭燃烧着，照亮了整个村庄和对面的山坡。我带着家人手拿小烟花围着火塔转，孩子们嬉闹的情景，给这个除夕增添了喜庆的氛围。

瓦窑堡的炭火头硬，热量高，像瓦窑堡人，骨头硬，热情高。瓦窑堡的炭，燃烧着一方水土古往今来的历史云烟，还有瓦窑堡人世代代的烟火气。当时光被瓦窑堡的炭持久的热能温暖着每一天，目及之处的人间物象，便是这一块蕴藏着光景日月密码的瓦窑堡的炭所解开的世事浮沉和斗转星移。



着一盏孤灯，将《白鹿原》再一次，从头到尾，细细地重读了一遍。那种感受，与初读时又自不同。少了几分情节的牵引，多了几分对文字、结构、思想的品味。我仿佛能看见，陈忠实先生是如何像一位老农一般，一锄头一锄头地在白鹿原那片深厚的黄土地上，开掘着民族的灵魂。那语言的力道，那结构的宏大，那历史的纵深感，都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差不多十年后，这种震撼依然在我胸中激荡，不吐不快。于是，我便写下了那篇后来获得较大声誉的《重读〈白鹿原〉感怀》。那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对一座文学高峰最虔诚的仰望，也是我作为一个读者，被一部伟大作品彻底征服后的心灵回响。不曾想，这篇文字，竟会通过那样的方式，被先生所知，并得到他那样一句珍贵的评价。

正因有着这样温暖的记忆，2016年4月29日，当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才感到一种彻骨的、近乎失怙的悲痛。那感觉，不像是失去了一位遥远的文学偶像，倒更像是痛失了一位至亲的师长。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难以从这种情绪中振作起来。心里总想着，该写点什么，为先生，也为自己这段受惠于他的文学因缘。然而，笔提起来，又放下。一种莫名的顾虑缠绕着我——在这样的时刻，用这样的文字，会不会被人看作是借名人的光环，来为自己“壮威”、贴金呢？这念头，竟让我迟迟不敢动笔。

今天，当我终于走在这西蒋村的“忠实路”上，当我沐浴在这由竹影、土墙和乡亲们朴素的怀念所共同营造的氛围中时，所有的顾虑，竟像被这原上的清风吹散了一般，霎时间烟消云散了。

陈忠实先生，是一个极其真实的人。他的人，就像他的文，厚重，踏实，不弄玄虚，不要花枪。他为人，也像他家门前的这条路，名字就叫“忠实”。这路，没有柏油马路的平滑光亮，它就是泥土与石子原本的样子，下雨时会泥泞，天晴时会起尘，但它结实，平稳，你走在上面，心里是踏实的，你知道它承得住你的重量，引着你走向你要去的地方。

这虽然只是一条乡间小路，但它所承载的，却是一个杰出作家用毕生的心血与真诚所赢得的人格丰碑。这条路，从西蒋村出发，早已越过了白鹿原，越过了西安，越过了陕西，它通向北京，通向每一个有华人读书的地方；它通向罗马，通向世界文学的殿堂，成为一条坚实的、全世界都知道和认可的康庄大道。这大道，不是用黄金铺就，而是用一部叫《白鹿原》的巨著，和一个叫“陈忠实”的、无比真实而高贵的灵魂铺就的。

夕阳的余晖，将西蒋村染成了一片温暖的金色。我最后望了一眼那紧闭的双扇铁门，那高墙内的竹梢，还有那写着“忠实路”的牌子，然后转过身，沿着来时的路，缓缓走去。

我没有带走什么（例如莫言老家的砖头），也没有留下什么（例如“到此一游”）。但我心里知道，有些东西，从此就不同了。这条名为“忠实”的路，已经不在西蒋村，它已经铺在了我的心里，铺在了一切敬仰他、热爱他作品的读者的心里。他们——我们，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山岭上的土旗杆

慕容明子

十一月的陕北，群山早已褪尽了最后一抹葱茏。目光所及，尽是皴裂的黄土与疏朗的枝干，风过处，枝桠相击，倒像在诉说着岁月的沉郁。

冬日的阳光总带着几分体恤，斜斜地穿过车窗，在膝头铺下一片暖融融的光斑。车过宝塔区麻洞川镇赵山村，拐进一条岔路时，我的视线忽然被远处山岭牵住——那道不算巍峨的山岭上，竟立着个奇特的土塔。

那土塔模样怪得很，说是塔，却更像一截陡然拔起的峰峦。圆中带方的轮廓，往上渐粗，到了底部反倒内收，像被巧手轻轻一拢，三四十米的高度，在周围环抱的树木间，竟透着股说不出的倔强。黄土的肌理被岁月冲刷得沟壑分明，却偏与周围的枯树、衰草浑然一体，仿佛自开天辟地时便在那里，沉默地守着这方山岭。

我忍不住停了车，寒风卷着土腥味扑面而来，却吹不散心头的讶异。掏出速写本时，指尖已被冻得发僵，笔在纸上沙沙地游走，想留住那份朴拙里的奇崛。土塔的影子被阳光拉得很长、很高，落在枯黄的草坡上，像幅淡墨勾勒的画。

离开前，偶遇一位掰玉米的老乡，问起那土塔，老乡咧嘴一笑：“那是‘土旗杆’哟，打我记事起就这般模样。”没有传奇，没有典故，只一句“向来如此”，倒比任何传说都更添了几分神秘——是谁的巧手，或是哪场风雨的无心之作，竟能让一堆黄土站成这般风骨？

我要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时，车又驶上岔路。回望那山岭，土塔已缩成一个模糊的剪影，却总觉得有什么在心头萦绕。是惊叹于天地的鬼斧神工，还是怅然于未知的过往？风依旧在耳畔呼啸，而那座沉默的土旗杆，还在山岭上，守着陕北的日月，守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老窗棂

——我的50年

于姣

门前冰封的小溪重新流动，当院中衰老的桃树重新开花，当远行的燕子重新归家哺育新生命，我就知道，我的故事永远不会结束。

我是延安一座普通老窑洞的窗棂，我的生命流动于老主人将我砍伐下来的那一刻，我看见他黝黑的脸，还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家庭责任的坚毅，忘不掉，我被他用简陋的刨子一遍遍刨到不那么粗糙后，被安在那四方土框上，窗格被老主人用浆糊糊上纸，他轻轻地抚摸我，从此我一辈子的使命就是守护这小小一隅的平安。

最初的日子，我的眼里只有黄土坡。天刚亮，黄土路就被锄头的影子划开，男人裤脚的泥点子，落在我脚下的石板上，晒干了簌簌往下掉。孩子们刚放学就去山上割猪草，女人坐在我旁边纳鞋底，针脚穿过粗布的“沙沙”声，顺着黄土高坡的风，那时的风还带着土腥味，一齐穿过了我的缝隙，也带来了远方的忧愁。

上世纪80年代的夜晚，月光总是很清亮，常有个扎羊角辫的小闺女，踏着脚在我隔出的方格里数星星。“窗棂子啊，窗棂子。”她小声地嘟囔，“今天老师对我们说，有个东西不点煤油也能发光，好像叫什么电灯，真的有这么神奇吗？你说，咱这儿的人也能见着吗？”我记下了。后来，她在我的窗格上系了根红头绳，背着书包，去了山外的学堂。此后那些年，我见证着一盏电灯如何照亮窑洞，第一声广播如何惊起山雀，故乡的夜，从此不再只有煤油灯的昏黄。

后来，风里的土腥味淡了，多了槐花香。这是新时代，谁家买了第一个电视机？又是谁家开了第一个小卖部？最重要的应该还是谁家出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临行前的那个夏天，抱着书本的后生来跟我道别，他摸着我的“老窗棂，等村里的路通了，我就回来了。”他再回来时，拉着戴眼镜的姑娘，带着厚厚的图纸。那天，压路机的轰鸣撞开了沉默的山林，泥泞的土路铺上了柏油，像一条黑色丝绸铺在绵延不绝的沟壑里。我每日望见的，也不再只是沉默的荒山，脆甜的苹果代替了愁苦，整齐的田地有序地排开，村口安上了路灯和标识，远处的山路上第一次出现了游客的相机闪光。后来，老屋集体翻修，子女们都劝老主人将我换成密封性更好的铝合金窗框，可他却执意不肯，他说：“老屋见证过风霜，藏着抹不去的烟火气，换了它，这屋子也就没了根。”于是，工匠小心翼翼地把我拆解下来，重新打磨、上漆，继续守在那四方框上，见证岁月的更迭。

现在，黄土高坡的风去了苦，只剩下了甜。近处的苹果高挂枝头，比天上的星星还稠，远处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花，是流动在山上的海。当年扎羊角辫的小闺女已经鬓染霜华，她又带回来了一个小闺女，正值青春年华，回到老屋，她还像以前一样趴在我身上，指尖轻拂过我的窗格，眼里满是怀念，我知道，她怀念的不仅是过去的旧时光，更是藏在我窗棂间的亲情与温暖。她们将延安城的照片贴在我身上，高楼大厦，汽车穿行的马路，沿河畔的柳影，挤着我的宝塔山……照片里的光，和我脚边的太阳能灯一样亮得暖人。

窗棂没变，但日子变了，我还是那根老榆木，可在我的眼里，这座高坡上的小城，已经从黄土上的漫漫风尘，长成了青山里的甜甜光景，从雾蒙蒙的山影，变成了灯火通明的城。看昨日的信天游变成今天的二维码，看祖孙三代的梦想都融入我的窗棂。

我是沉默的记叙者，我依旧守着这里，晨起暮落，听风雨在耳边呢喃，如果你来到这里看到我，请你轻轻地抚摸我，抚摸我的纹路，仔细地听我说。

西蒋村开了一条「忠实路」

张兴源